

A New Historicist Study on Don DeLillo's Fiction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 唐·德里罗小说研究

范小玫 著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 唐·德里罗小说研究

范小玫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范小玫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15-5328-2

I. ①新… II. ①范… III. ①小说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931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300 千字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杨仁敬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研究日益深入，视野不断扩大，方法呈多样化趋势。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小说家唐·德里罗越来越受重视，其作品逐渐成了许多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涉及其中的媒体文化、消费主义、生态意识、空间叙事以及恐怖主义等。如今，范小玫又从新历史主义视角，研究了德里罗的 9 部主要作品。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德里罗小说研究，也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研究增添光彩。

范小玫的专著《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是她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篇论文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通过答辩，校内外专家评审结果为优秀。范小玫以不懈的努力换来了这可喜的成果。

范小玫对唐·德里罗的兴趣由来已久。1988 年，她从本校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2001 年考取本系英美文学专业硕士生，曾以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噪音》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2005 年 3 月，她考取了博士生，跟随我研习美国小说。她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刻苦努力，成绩优秀，还挤时间出版了《美国短篇小说选读》，并以此为教材，给全校同学开设了选修课——“美国短篇小说”。没料到，选修的同学很多，教学效果意外的好，接连开了几轮，深受同学们欢迎。该书第 1 版 3000 册很快售罄。

动笔写博士学位文时，范小玫多次与我交流意见。她提出想继续研究德里罗。我觉得她在这方面有些基础，就欣然同意了。2010 年 9 月，范小玫有幸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进修一年。其间她一面选修相关课程，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一面广泛汇集最新资料。回国后，她继续埋头修订论文提纲，开始撰写初稿。没想到另一位导师的一位博士生也在写评论德里罗的学位论文。我们及时进行了沟通，发现两人虽然都评论德里罗的小说，但视角不同，论文结构也很不同，不存在“撞车”问题。一个作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和评析方式，即使视角迥异，不同的评论者同样能写出优秀的论文。思想认识统一以后，范小玫终于定下心来，并接受我的建议：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评论德里罗的



主要小说。我很高兴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接着，她信心十足地抓紧研读有关新历史主义的论著，细读德里罗的小说文本，重新修订了论文提纲，使论文重点突出，并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不久，论文的初稿完成了。

唐·德里罗是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的优秀代表。他和海勒、品钦、纳博科夫、加迪斯、梅勒、加斯、苏克尼克、莫里森、汤亭亭和多克托罗等人一道被载入史册。他在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充满反讽、戏仿和去中心的后现代语境，同时杂糅了许多现实主义细节，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美国后工业社会千奇百怪的生存状态，从不同的层面描绘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危机，字里行间包含着可贵的人文关怀。因此，他的作品拥有大量读者，在美国国内外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本书将德里罗放入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加以重新认识，选题属于学科前沿。它将作品研究与西方文论相结合，展示了德里罗是个勇于批评美国后现代文化的美国当代编年史家。因此，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体来说，本书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本书紧紧抓住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和蒙特洛斯的主要论点，尤其是蒙特洛斯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此为中心，深入评析德里罗文本的历史性。作者将德里罗的小说置于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复杂关系中进行考察，探讨它们怎样表现美国后现代社会状况。《天秤星座》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前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及其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而《坠落的人》则揭示了美国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德里罗通过他的小说文本揭示和批评了美国后现代文化。

同时，本书还进一步评析了德里罗的《白噪音》、《毛二》和《地下世界》如何展示历史的文本性。这些小说记录了德里罗所处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特征，重现了美国当代的秘密历史。德里罗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历史，将历史表现为多种迷人的故事，从而挖掘出被历史表象和官方档案所掩盖的历史，成为一位出色的当代美国编年史家。

第二，重视文本分析，注重评析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本书选取了德里罗已出版的9部小说进行评论。它们是：《美国志》、《玩家》、《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地下世界》、《大都会》、《坠落的人》和《欧米茄点》。这些涵盖了德里罗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评论的范围大大地超过了国内学界所关注的《白噪音》和《天秤星座》两部。不仅如此，本书还将这9部长篇小说与德里罗的一些短篇小说、重要文章和访谈录联系起来考察，使评论具有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特点，立论也更客观公正。

本书一方面以新历史主义为中心,另一方面注意结合相关的西方文论,以加深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理论阐释,如本书第一部分梳理了4位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观点:丹尼尔·贝尔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论后现代社会状况、鲍德里亚论消费社会和詹姆逊论晚期资本主义。这些理论与德里罗用小说记录的社会变态和历史真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仅帮助读者加深了对德里罗小说文本的历史性的理解,而且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及潜力。

第三,紧扣历史语境,注重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对照。本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注意文本、语境和理论相结合,处处将德里罗虚构的艺术世界与美国现实社会相对照,比出了二者的差异,也比出了德里罗小说文本的特色和意义。

在评论《天秤星座》时,作者首先探讨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的历史背景和民众的反应,然后再与《天秤星座》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政府出台的《沃伦委员会报告》相对照,指出德里罗小说文本的反叙述特点,凸显他对美国媒体的戏仿和反讽。德里罗将对元小说的反思与对官方历史的质疑结合起来,使他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人物同台表演,让文本化的过去融入他构建的文本。

《坠落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小说借鉴了许多媒体的报道和《“9·11”委员会报告》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德里罗自己独特的见解。本书认真考察了“9·11”恐怖袭击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该事件前后美国人的种种反应以及当时充斥于美国媒体的各类宏大话语,展示了德里罗对美国后现代文化的尖锐抨击,显得生动有力,令人信服。

此外,本书对《地下世界》的评析也具有同样的特色。书中指出德里罗精心挖掘历史,选择美国中情局局长胡佛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以揭示美苏两国冷战时期的地下历史。小说从一场棒球比赛开始,描述苏联核爆炸成功后美国的核忧虑。有人宣称1951年10月4日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便是冷战开始的第一天。紧接着,美国加快了纳瓦达的一系列原子弹新试验。苏联的第二次原子弹爆炸,经过美国媒体的渲染,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核恐惧,使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尽管棒球比赛空前活跃,核恐惧仍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60年代美苏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双方严重对峙。后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互相妥协,和平解决危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了,美国留下一大堆核废料。《地下世界》描写了核废料的历史:苏联哈萨克斯坦试验场和美国纳瓦达试验场。1945—1992年间,美国进行了1054次核试



验，比苏联多了300次。核废料堆积如山，四周污染严重，平民死伤不少。德里罗认为20世纪后期的美国文化由两种废料组成：核废料和资本主义大众媒体产生的废料。许多地方成了艾略特所说的文化“荒原”。所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核军备竞赛留下了无数埋藏新武器和核废料的地下世界，留下了一大片荒原，也许艺术是个忏悔的希望……

这些虚实结合的评论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加深了对德里罗小说文本的理解，深刻地揭示了其小说创作的社会意义。

第四，关注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力求主题思想与艺术手法评论的统一。本书由绪论、结语和三个章节组成，结构严谨而合理，逻辑性强，概念清晰，层次分明，格式规范，资料翔实，文笔流畅，表述准确。本书不仅汲取了海内外本学科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梳理了许多重要文献，提出了富有创意的见解，而且关注德里罗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做到主题思想与艺术手法评论的统一，展示了小说家德里罗的完整形象。

本书指出：多视角、非连续性叙述、黑色幽默和互文性构成了德里罗小说文本的四大叙事策略，它们有力地帮助德里罗再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乱、碎片化、随意性、荒谬性和不确定性。德里罗继承了乔伊斯、福克纳、梅勒、达戈尔和兰尼·布鲁斯等人的优秀传统，并加以大胆的创新，杂糅了许多现实主义的特质，集后现代派艺术手法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美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人开玩笑地说，德里罗很像他小说《地下世界》里所描述的艺术家的，他悄悄地从历史垃圾的填埋场寻找文学创作的视角和表现手法，揭示美国社会的阴暗面：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媒体操纵和消费文化造成社会的扭曲和变态、冷战带来的恐惧和困惑、“9·11”恐怖袭击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贫富悬殊、城市里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德里罗成了一位勇于揭露现实、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小说家。

本书不回避矛盾，而是面对现实，大胆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评论界有人认为德里罗遵循狄更斯、马克·吐温和德莱赛的传统。他既不是个现代派作家，也不是个后现代派作家，而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德里罗是个出色的后现代派作家。尽管他的小说里具有许多现实主义因素，但他巧妙地采用了独特的后现代派叙事策略，精心描绘了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状况——媒体的垄断一切和消费主义的横行、人们的焦虑和社会的扭曲，反映了德里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历史观。这些细致而客观的评析体现了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勇气。

古人云：“成功在久不在速。”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

可算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诚然，成功来之不易，这是范小玫长期努力的结果。学术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求快速，但求持续向前不停步。我希望范小玫以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继续发挥正能量，向更高的目标奋进，稳步实现新梦想，争取获得美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新丰收。是为序。

2015年1月6日

于西村书屋

前言

唐·德里罗（1936—），美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和评论文章。至今他已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获奖无数，其中包括：1985年《白噪音》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2年《毛二》获得笔会/福克纳奖，1999年获得耶路撒冷奖，2010年获得笔会/索尔·贝娄美国小说成就奖，2013年获得首届国会图书馆美国小说奖。德里罗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备受赞誉。哈罗德·布鲁姆曾这样评论过：美国当代有四大小说家，德里罗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是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思和科马克·麦卡锡。目前大约出版了25部研究德里罗的专著。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德里罗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他的一些小说有了中译本，一些评论其小说的文章陆续发表。2001年，本人完成了研究《白噪音》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研究德里罗小说的硕士论文。如今，已有近50篇研究德里罗小说的硕士论文。近年来有一些博士生研究德里罗，可以查到的有关德里罗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有5篇。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研究其单部小说《白噪音》或者《天秤星座》，探讨媒体文化、消费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主题。本书试图另辟蹊径，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对德里罗的作品进行综合性评论，以研究其小说与美国当代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作品分析涵盖其9部小说，它们是《美国志》、《参与者》、《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地下世界》、《大都会》、《坠落的人》及《欧米茄点》，此外还涉及他的短篇小说、重要文章和访谈。

蒙特洛斯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最恰当地概括了新历史主义的特点。蒙特洛斯对这两个关键词的阐释表明：“首先，文本总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因而不是‘永恒’的艺术品。……我们所谓的历史本身是我们对历史文献，即文本，阅读的产物。”（Hiscock and Longstaffe 96）历史性是文本性的产物。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写作是个诗性的过程，历史叙述是“语言造物”。怀特关于历史叙述的理论填平了历史事实与虚构的鸿沟。历史与小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历史本质上是虚构的，或者是文本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发挥相同的作用。”（Gu 14）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本书试图论证：德里罗用



小说的方式书写了美国后现代历史，他也因此成为小说家中的历史学家。

首先，本书探讨了德里罗文本的历史性。德里罗的写作生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在美国产生，在 70 年代逐渐发展，在 80 和 90 年代达到鼎盛。德里罗的小说探究了美国的后现代性，力图再现美国当代文化的整体风貌，记录了美国后现代化的过程。本书将德里罗的作品置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中，在后现代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究它们是如何反映后现代状况的。西方有不少理论家对后现代社会进行了理论阐释，本书梳理了其中 4 位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布希亚德的消费社会和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些理论家忙于建构后现代理论时，德里罗在忙于他的后现代小说的创作。他们所描述的后现代社会状况正是德里罗所经历的，本书视其为德里罗小说创作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后现代理论家们试图用理论描述他们所感受到的后现代思潮，而德里罗则用小说记录其所见的社会变化和历史现实。

蒙特洛斯的“文本的历史性”可以理解为“历史塑造当下，当下重塑历史”（Montrose 24）。本书以《天秤星座》和《坠落的人》为例进一步论述德里罗文本的历史性。首先，本书研究了“肯尼迪遇刺”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美国心理的冲击，研究了德里罗创作《天秤星座》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分析为什么德里罗要呈现一个不同于《沃伦委员会报告》的“肯尼迪遇刺”事件。本书还考察了美国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分析了为什么《坠落的人》虽然严重依赖媒体的报道和《“9·11”委员会报告》的调查发现，但呈现的是一种反叙述，而当时美国媒体上则充斥着恐怖主义叙述和民族主义的宏大话语。对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能洞悉德里罗如何通过其文本对美国后现代文化进行批评和解剖。

其次，本书探讨历史的文本性。本书分析了德里罗如何通过其小说《白噪音》、《毛二》和《地下世界》记录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再现美国当代的秘密历史。新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只有通过残存的文本痕迹才能接近历史。历史只有通过叙述化和文本化的方式才能显现。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向重点不是大写的历史，不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而是小写的各种历史，充满了异质性、零碎化、矛盾和差异。这种观点与利奥塔的观点不谋而合。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摒弃历史总体化、主导叙事或者宏大叙事的观念。我们应该允许多个互相对抗、互相矛盾的小历史或故事共存。小说把历史呈现为多个故事。因为我们只能以故事的形式理解有关人的事件和经历。小说家有时等同于历史学家：他们以小说的形式写历史，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很多过去的事情。德里

罗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历史学家，他详细地描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美国的生活。他是当代美国的编年史家，是“秘密历史”的专家，能够挖掘被历史现象和官方档案所掩埋的历史。

最后，本书分析讨论了德里罗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多视角、叙事的非连续性、黑色幽默和互文性。这四种叙事策略帮助德里罗再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乱、碎片化、随机性、荒谬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叙事策略在文学中早已存在，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成为后现代文学的主要叙事技巧。德里罗通过“回收”乔伊斯、福克纳、梅勒、戈达尔和兰尼·布鲁斯等前人的叙事手法进行加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美国后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像《地下世界》中的艺术家，在历史的垃圾填埋场中寻找创作的视野和手法。

蒙特洛斯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表明：文学或是任何特别的文本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 also 对社会产生影响 (Montrose 23)。德里罗的作品不仅是当代社会的产物，而且还通过建构美国后现代独特历史叙事、解剖美国后现代社会，像诺曼·梅勒一样，影响了美国当代的思想意识，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对抗性作家。

德里罗还是个颠覆性作家。他的小说致力于描写美国的阴暗面：这是国家及其话语常常掩饰或忘记的那一面。德里罗描写了美国自然环境如何遭到技术和消费主义的破坏；视觉导向的消费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美国社会由于媒体操纵和消费文化占主导产生了专制主义；城市的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冷战带来的焦虑和多疑；“9·11”恐怖袭击造成的创伤。德里罗认为自己的小说关注的是“危险时代的生活”。他极力主张作家要抵制权力，“抵制权力试图强加于我们的一切” (Bou and Thoret)。由于他的作品揭露现实，他被当成坏公民和左派偏执狂而受到谴责。

德里罗的小说再现了美国的后现代现实，探讨了美国的后现代性，因而他是个编年史家。同时他还是美国的乔纳森·斯威夫特，讽刺了被消费主义吞噬、受恐怖主义困扰的美国社会；他是美国的查尔斯·狄更斯，利用后现代生活中的有毒元素来“表现产生这些元素的社会所存在的道德缺陷” (Ryan 794)。德里罗是美国社会的批评者，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是人类追求个性与自我实现这个事业所遇到的最坏敌人” (Lentricchia, *Introducing Don DeLillo* 5)。德里罗在小说中刻画了很多抵抗性艺术家，他们抵抗自己深陷其中的权力制度。德里罗的小说展现了后现代时代难得的道德力量。尽管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影像文化泛滥，消费主义盛行，文学已被边缘化，但德里罗依然坚持做美国社会忠实的镜子和良心。一些批评家认为，德里罗既不是现代派作家，也不是后现代派作



家，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遵循狄更斯、马克·吐温和德莱赛的创作手法。但笔者认为，德里罗是个后现代派作家，因为其小说不仅描写了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媒体饱和社会中的美国人的生活，而且也体现了小说作者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后现代观，还例示了后现代主义小说颇具创新的叙事策略。德里罗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元素表明，德里罗是个具有社会责任感、道德感和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可以认为，他是个美国后现代编年史家。他的小说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后现代文化。

Contents

前言 /I

Introduction / 1

I. DeLillo's Life and Career / 2

II. Research Reviews on DeLillo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11

III.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of the Book / 19

1. New Historicism and the Key Representatives / 19
2.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 Book / 24

Chapter One The Historicity of DeLillo's Texts / 31

I. Context: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31

1. Daniel Bell's Theory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32
2. Jean-François Lyotard's Analysis o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34
3. Jean Baudrillard's Idea of Consumer Society / 36
4. Fredric Jameson's Viewpoint on Late Capitalism / 41

II. The Chronicler of America: 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 45

1. *Libra*: The Origin of American Postmodern Condition / 46
2. *Falling Man*: A "Brave New Chronicler of the Age of Terror" / 60

Chapter Two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DeLillo's Chronicle of Postmodern America / 87

I. *White Noise* / 89

1. "Death Is in the Air" / 89
2. "As Long as the Supermarket Did Not Slip" / 104

II. *Mao II* / 114

1. "When the Old God Leaves the World" / 115
2. "Nothing Happens Until It's Consumed" / 121



3. "Novelists and Terrorists Are Playing a Zero-Sum Game" / 133

III. *Underworld* / 143

1.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 143

2. "We're All Gonna Die" / 152

3. "Waste Is the Secret History" / 158

4.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in the End" / 172

Chapter Thre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DeLillo's Fictional Texts / 175

I.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 176

II. Discontinuity in Narration / 182

III. Black Humor / 186

IV. Intertextuality / 191

1. Allusion / 193

2. Adaptation / 195

3. Pastiche / 196

4.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 198

Conclusion / 202

Works Cited / 215

Acknowledgments / 228

Introduction

Don DeLillo is a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 playwright, and essayist. He has published 16 novels, more than 20 short stories, 5 major plays, and a few essays over the last 50 years. He has received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the PEN/Faulkner, the PEN/Saul Bellow Award, the Common Wealth Award of Distinguished Service for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various other distinctions internationally. According to a survey made b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n 2006, three of DeLillo's novels—*Underworld*, *White Noise*, and *Libra* were voted by 125 prominent writers, critics, and editors to be “the Best American Novel[s] of the Past 25 Years.” DeLillo now stands “in the first rank with Thomas Pynchon, Toni Morrison, Philip Roth, and John Updike” (Duvall, Introduction 1).

DeLillo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ostmodern writer (LeClair 9; Keesey 198; Cowart 2; Schneck 204). He explores many postmodern themes: consumerism, paranoia, terrorism, conspiracy, simulacra, saturation of mass media, psychology of the crowd,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society. He depicts many historical events in his works: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Libra*), the 1951 National League playoffs of baseball, the Soviet Union's nuclear test (*Underworl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White Noise*), Salman Rushdie's exile for *The Satanic Verses* (*Mao II*), and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Falling Man*, 2007). And he's also been writing terrorist novels for the past 30 years. “Terrorists have been making regular appearances in his books since *Players* (1977)” (Binelli).

DeLillo writes about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y and represents a panorama of American life from the 195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is works show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ity of American society. They provide us an insight into American society and its culture which is saturated with mass media images so much that the very remark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is almost erased. “What makes DeLill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novelists since 1970 is his fiction's repeated invitation to think historically” (Duvall, Introduction 2). He challenges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gives the readers a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 is a cultural critic. He belongs to the kind of “writers who conceive their vocation as an act of cultural criticism; who invent in order to intervene; whose



work is a kind of anatomy, an effort to represent their culture in its totality; and who desire to move readers to the view that the shape and fate of their culture dictates the shape and fate of the self" (Lentricchia, "The American Writer as Bad Citizen" 1).

For decades Don DeLillo has been engaged in an oppositional writing which challenges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which, according to Jameson, "all aesthetic production now is nothing more than a form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Duvall, "The Power of Hist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stery" 2). DeLillo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ocial critic and cultural anatomist. He was criticized by "the media political right" as "a bad citizen" (Lentricchia, "The American Writer as Bad Citizen" 3), and was once "denounced as a member of the paranoid left" (DeCurtis 73). To the criticism, DeLillo replied in an interview: "Being called a 'bad citizen' is a compliment to a novelist, at least to my mi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ought to do" (qtd. in Remnick 142). DeLillo admits that politics plays a part in some of his books (DeCurtis 73) and claims "fiction must contest in power" (Moss 165). Indeed, politics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ndispensable theme in post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Linda Hutcheon, the cultural activity of postmodernism is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ory, resolutely historical, and inescapably political"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4). In my view, DeLillo is political in that his works launch a serious critique of postmodern America.

I. DeLillo's Life and Career

Don DeLillo was born into an Italian immigrant family in New York City on November 20, 1936. He grew up in the Italian-American neighborhood of the Bronx. It was a childhood of sports and games. As a teenager, DeLillo did not read much until he was 18 years old when he started to read William Faulkner, James Joyce, and Ernest Hemingway. DeLillo was raised as a Catholic. He came from a Catholic family and attended Catholic schools. In 1954 he graduated from Cardinal Hayes High School in the Bronx. After he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Arts from Fordham University in the Bronx in 1958, DeLillo took a job in advertising and worked for five years as an advertising copywriter at the ad agency of Ogilvy & Mather in Manhattan. In his spare time he started to write fiction. In 1964 he quit his job in the agency and devoted himself to fiction writing. In 1975 DeLillo was married to Barbara Bennett, then a banker and later a landscape designer. They do not have children and now live in Bronxville, a suburb of New York City, the city which

serves as the setting for many of his novels. In an interview he stated, “I became a writer by living in New York and seeing and hearing and feeling all the great, amazing and dangerous things the city endlessly assembles. And I also became a writer by avoiding serious commitment to anything else” (Bing).

In 1960 DeLillo’s first work of fiction, a short story, “The River Jordan,” was published in *Epoch*, the literary magazine of Cornell University, which also brought to light the first published fiction of Thomas Pynchon, and Stanley Elkin, along with early stories by Philip Roth and Joyce Carol Oates. The following years saw more of DeLillo’s short stories appear in *Epoch*, *Kenyon Review*, and *Carolina Quarterly*. In 1971 DeLillo published his first novel *Americana*, which manifests his career ambition, recurring themes, styles and techniques in his works. What does *Americana* mean? It refers to artifacts, or a collection of artifact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geography, folklo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studies of American culture. Since his first novel, DeLillo intended to take the entire American culture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creative writing. “That DeLillo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serious subjects—the failure of language, the state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Cold War, technology—had been evident as early as *Americana*...” (Ruppersburg and Engles 2). David Bell,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narrator, works for a television network as an executive that produces images. His father works with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believes that image is everything. With a movie camera in hand, David travel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 quest of his own identity or the national identity. His journey is called “post-Kerouac pilgrimage” (Champlin 7). David plans to make his own film of discovering America, and in the meantime exploring part of his consciousness to discover himself.

Americana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In 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LeClair in 1982, DeLillo said that this novel was the one closest to his own experience “in the sense that I drew material more directly from people and situations I knew firsthand” (DePietro 4). There are some references and allusions to the movies, novels, skills that have influenced him. David Bell thinks himself as a “child of Godard and Coca-Cola” (DeLillo, *Americana* 269), “a witty rephrasing, one step removed, of Godard’s famous reference to himself as a ‘child of Marxism and Coca-Cola’” (Keesey 14). When asked about the influence on his writing, DeLillo said, “I think more than writers, the major influence on me have been European movies, and jazz, and Abstract Expressionism” (qtd. in Passaro 79). DeLillo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Jean-Luc Godard’s movies which, “with their jump cuts and arresting images, would have a major impact on *Americana*” (Keesey 3). He admitted to Thomas LeClair about his affinities with